

以“用工荒”为契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辜胜阻 李 华

【摘 要】文章在分析当前“用工荒”现象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结构变化及区域间就业比较利益调整是引致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重要因素;“用工荒”现象是对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也是推动经济转型的重要契机。文章提出,要充分利用“用工荒”形成的市场倒逼机制,通过调整区域产业布局、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及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等措施,推进中国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和健康均衡城镇化战略的实施。

【关键词】用工荒 城镇化 经济转型

【作 者】辜胜阻 武汉大学战略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李 华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用工荒”现象最早在 21 世纪初开始受到媒体和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主要反映的是春节期间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劳动力短缺问题,是局限于一定范围和特定时间的现象。近年来,“用工荒”问题越来越严重,特别是 2011 年的形势变得更加严峻。一是从时间上看,以往的“用工荒”主要是元旦前后伴随着农民工陆续返乡而出现,春节后比较明显,而今年的“用工荒”来得更早。来自珠三角的调查显示,2010 年全年企业普遍招工比较困难,2011 年春节前数月就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用工荒”现象(辛灵,2010)。二是从范围上看,不仅东部沿海面临“用工荒”问题,四川、湖北、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也出现了用工短缺的现象。据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底,安徽缺工超过 50 人的企业达 2 300 余家,缺工总数达 25 万人(成展鹏,2011)。三是从工种上看,涉及类别更多。当前不仅技工荒,普工也荒。传统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缺工现象比较突出。调查显示,广东企业的普工缺口相对较大,约占总量的 68%,同时技工缺口仍处高位,约占缺工总量的 32%(李波平、田艳平,2011)。愈演愈烈的“用工荒”现象意味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格局正在从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向局部短缺甚至全面短缺演变,同时也预示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与“用工荒”现状

出现“用工荒”的原因是复杂的,主要反映出当前中国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

系的深刻变化。

第一,中国农村劳动力供给总体上过剩,转移就业的压力依然较大,但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突出。

从总量上看,现阶段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总数估计在 0.6 亿~1 亿之间(“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十二五”期间,预计每年有 800 万左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加上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量,劳动力年供给总数超过 3 000 万,而实际上城镇能够安排的劳动力大约只在 1 200 万左右(姜贲,2011),供求缺口十分明显。可见,中国劳动力供给总体上是过剩的,理论上讲未来一段时间内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总体形势不会改变。然而,日益突出的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将影响农村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发展走势。

首先,中国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已明显减少。随着农村劳动力以“民工潮”形式大规模的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已明显减少,特别是近几年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见图)。据统计,2008 年以来,农民工后备力量共减少了 2 000 万人左右(萧琛等,2010)。

其次,农村剩余劳动力中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已经不高。从农村分年龄段人口比重的变化趋势来看,15~39 岁青壮年劳动力的比重逐渐下降,而 40~64 岁中老年劳动力的比重则出现明显上升的态势(见图)。

2005~2010 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从 36.54%和 31.95%变为 35.02%和 36.3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0)。青壮年农民工的短缺化趋势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释放空间已经比较有限。农村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变化趋势是中国的人口转变及劳动力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缩影。

第二,农民工群体内部出现分化,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的转变是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突出问题。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外出打工的老一代农民工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素质退化的问题。老一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低,在就业过程中,企业往往尽量压低雇佣成本,极少对农民工进行在职培训,人力资本的积累极其缓慢。因此,除了体力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他资本可以交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代农民工“青春红利”逐渐折耗,素质不断退化,正在逐步退出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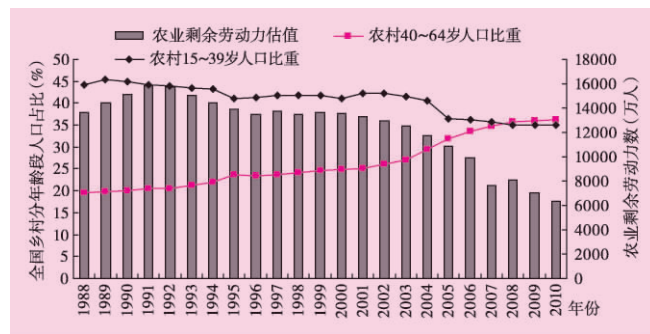


图 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及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

注:1988~2005 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估值转引自陈星(2009);2006~2010 年农业剩余劳动力估值根据相同的估算方法推算得到。

资料来源:《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陈星(2009)《农业剩余劳动力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经济动态》,第 5 期。

动力市场。

农民工群体分化的最突出表现是新生代农民工或称第二代农民工的产生。这一部分人占全部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已成为中国外出农民工的主体,是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力量。新生代农民工在诸多方面表现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他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从小生活环境相对较好,外出打工的目的不再只是“挣钱”,而是对尊重、平等和社会承认有更多的期盼,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和文化生活等有更高的要求。

第三,农民工在东部和中、西部就业的收益差距逐步缩小,但生活成本差距越来越大,选择就地就业、创业成为新的趋势。

随着中西部地区就业岗位的增加、工资待遇的提高、农村福利的改善和社会代价的降低,部分农民工选择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内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一是在就业、创业方面,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力度,同时东部向中、西部产业转移的力度也逐年加大,为中西部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二是在工资待遇方面,东、中、西部的农民工工资待遇差距已经逐步缩小。据统计,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1422元,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则分别已达1350元和1378元,东部和中、西部农民工月均收入相差仅为72元和44元(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如果把异地转移的交通成本及区域之间生活成本的差距计算在内,实际上东、中、西部之间农民工净收入差距已经不大。三是在福利改善方面,随着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和贯彻落实,农村的福利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除了上面提到的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以外,粮食、农资、良种及农机等“四项补贴”的落实带来了农民转移性收入的提高,“新农合”及“新农保”政策的出台和逐步完善则大大提升了农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四是在社会代价方面,进城农民工长期以来义务和权利不对等,地位与身份不一致,社会地位“边缘化”,“过客”心态重。上述一系列变化实际上提高了农民工流向东部就业的机会成本,使农民工对其现行市场价格低估,其货币价值打了折扣,没有达到农民工供方的预期价格(郑秉文,2010),于是出现了减少其劳动供给的客观结果。

可见,正是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规模和年龄分布的变化、农民工群体结构的改变及区域之间就业比较利益的调整,带来了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了“用工荒”现象的出现。“用工荒”是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的一种过程,随着劳动力总量、劳动力结构和比较利益及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中国的“用工荒”问题还会加剧,形成经济发展的“拐点”。

二、“用工荒”倒逼中国发展方式转型

“用工荒”现象的出现并呈常态化、深化发展的趋势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转折时期的到来。“用工荒”是对现有发展模式的挑战,预示着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的终结

将逐渐成为现实,也进一步暴露出了长期以来中国劳动力转移及劳动力市场发育中的诸多问题。“用工荒”更意味着转型的“拐点”,只要积极疏导、应对得当,必将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一种契机。

以农民工为主要代表的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支撑中国传统发展方式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工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劳动力的关系看,劳动力转移的持续时间和转移后劳动力边际产出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只要劳动力转移过程得以持续,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现象就将长期持续,而由劳动力转移、高储蓄、高投资共同推动的内生式经济增长就不会停止(李杨、殷剑锋,2005)。分析表明,1978~2009年中国经济9.9%的复合增长率中,劳动力的数量、人力资本、劳动力部门转移、物质资本和体制改革或技术进步等未解释部分的贡献率分别为24%、24%、21%、28%和3%左右(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2010)。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及转移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效率提高扮演的角色并不明显。相比于日本20世纪50~7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中21%左右的劳动力贡献率、24%左右的资本贡献率及55%左右的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Hugh Patrick等,1976),中国经济增长明显过度依赖劳动力。从中国参与全球化与劳动力的关系看,丰富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赢得全球化产业分工的基础。中国出口产品中的纺织服装、家具、灯具、玩具等杂项制品;鞋帽、伞、杖;羽毛皮革制品;编织品等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重为20%左右,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的比重为50%左右(宋泓,2010),反映出中国的对外贸易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用工荒”现象是对中国现存经济发展方式的挑战。上面的分析表明,近似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优势。然而“用工荒”的出现和持续发展意味着这一优势正在弱化,主要的标志就是“用工荒”已经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2004年之前的12年中,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程刚等,2004)。如果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农民工工资甚至是下降的。然而,这种情况在2004年之后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21世纪初“用工荒”爆发开始,农民工工资结束了长期的停滞状态,并呈现出快速上升的发展势头。截至2010年,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水平已经延续了7年的上涨态势,总体涨幅超过1倍。这表明中国廉价劳动力时代正在逐步消失,长期以来过度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终将无法维系。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用工荒”带来的倒逼转型的市场力量,改变长期以来依靠廉价劳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找准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泉,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和创新驱动,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前,不仅要充分认识到“用工荒”影响下中国经济转型的“远虑”,同时要重视“用工荒”现象凸显出来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近忧”,以及由此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一是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大量进城农民工只是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并没有实现身份转变,处于“半城镇化”的尴尬境地,很少有机会能够

充分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从某种意义上说,“用工荒”是农民工在权益保障方面的无声反抗。二是对企业用工问题上的不当偏向敲响了警钟。相当一部分用工企业在用工年龄、性别甚至地域上设有各种限制。比如,许多招工企业都只把眼光盯着1亿多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而忽视了35~55岁的农村劳动力这一更为庞大的用工群体(郑风田,2011),客观上限制了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调查表明,49%的招工企业要求初中文化程度,25%的招工企业要求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任社宣,2010)。而实际上高达76.5%的外出农民工仅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技能培训的超过一半(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劳动者的技能结构与用工企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的错位。四是对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提出了新的要求。农民工经常性、季节性的乡城流动,形成了一种地理意义上割裂的劳动力市场,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发挥自发调节供求和重新配置资源的功能(蔡昉,2010)。显然,这些要求也是应对“用工荒”问题、推动经济转型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重点问题。

三、以“用工荒”为契机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思考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城镇人口为6.6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49.68%(国家统计局,2011)。预计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将超过50%，“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入城市时代。未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解决好城镇化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实现城镇化发展从偏重东部向东、中、西部协调发展转变、从“半城镇化”向完全意义上的城镇化发展推进。

第一,把推进区域产业布局调整与减缓过多的农民工异地流动结合起来,东部地区要通过产业转移推进产业升级,中西部地区要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吸纳当地农村转移劳动力,让更多的农民工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减缓长期以来形成的大规模的“钟摆式”、“候鸟型”人口流动的社会代价。

东部地区应该通过实施主动的产业转移及产业结构升级战略成为引领中国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经济转型的重点区域。要通过产业转移战略推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一方面引导产业关联度不高、资源消耗较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通过转移获得资源整合、市场拓展及成本节约等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帮助有潜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实现转型,通过机器设备代替手工劳动的流程升级、质量提高和新产品持续开发的产品升级、品牌建设及关注研发、设计、销售等产业链中高附加值环节发展的功能升级等形式推进产业升级(王保林,2009),培育新的市场竞争优势。要推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结构升级,避免在产业转移中出现“青黄不接”的产业空心化现象。一方面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培植新的内生经济增长源;另一方面把握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心向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等新兴产业转变以及重点领域向现代服务业转变的良好机遇(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2007),主动承接并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外力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

中西部地区应该通过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成为中国继续维系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重点区域。要营造良好的产业承接环境。通过改善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硬环境,通过理顺政商关系、转变政府职能等优化发展软环境。要以本地资源优势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核心,承接符合地方资源禀赋条件和主体功能定位的产业。将承接产业转移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有选择、有重点地承接产业转移,同时要更加注重项目质量,着眼于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防止被淘汰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和项目转移到中西部。

第二,把实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均衡城镇化战略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结合起来,引导乡城流动人口有序流动,避免“大城市病”,通过合理分流分类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帮助进城农民工顺利融入城市社会。

实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均衡城镇化战略是合理引导农民工流向的重要途径,其实质就是要实行“两条腿”走路的城镇化战略。一方面以都市圈为中心推行城市化,使一部分流动人口继续流向大都市圈,并在都市圈内部不同层级的城市间实现合理分布;另一方面在非都市圈地区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充分考虑人口合理流动的现实选择,引导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流。

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实现农民工从“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使其真正融入城市社会的关键。要因地制宜地推行渐进式的户籍制度改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不可能完全放开,但可以考虑设立一种经济导向、人口素质导向和社会规范导向三位一体的“门槛”条件(辜胜阻,1991),逐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中等城市则应该积极地放开;小城市、县城等可以完全放开。要推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利的政策扶持体系,特别是要解决好随迁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构建符合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落实工伤、医疗、养老等保险福利。

第三,把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与提升农民工素质结合起来,破除劳动力转移就业进程中的制度性障碍。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是解决摩擦性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其重点是搭建就业平台、畅通信息传递和搞好职业指导。建设一批布局合理、辐射力强的人力资源市场,并通过加强交流和资源共享形成互联互通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同时,加强监督管理,严厉整治欺诈等市场不法行为,形成劳动力市场良好的运行秩序。依托人力资源市场的平台优势,借助网络、电视、广播等各种传播媒介,形成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搜集和传递机制,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信息服务体系。制定符合农民工群体特点的就业指导计划,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求职技巧、能力测评、政策咨询等服务,形成就业指导的长效机制。

提升农民工素质是缓解结构性失业的主要途径之一,其重点是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供给,尤其是重视职业技能教育。纠正对职业教育的误解,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扩大到中等职业学校教育,落实好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和免除学费政策,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

育。在资源分配上加大对农村地区职业教育的扶持力度,努力建设一批规模大、条件好、质量高的农村职业技术学校。在培训对象上重点照顾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初中或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两后生”和已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在办学机制上采用民间社会资本参与发展民办职业教育的形式,形成多种形式的办学模式。在教学内容上以就业为导向,实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结合,教学内容与岗位能力对接。

第四,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推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广大农民工体面的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提升农民工用工企业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实现共建、共享式发展。

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是解决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渠道,也是支撑经济发展重要的微观主体。企业发展不仅肩负着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也承担着改善职工生活、促进职工全面发展的义务。因此,要实现职工和企业利益的双维护,既要保障职工的各项合法权益,也要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维护员工权益、稳定员工队伍的关键是构建“和谐稳定、平等合作、互利双赢”的劳资关系新格局。要深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积极探索适合中小企业和农民工特点的劳动合同形式,推进集体合同制度,规范完善企业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推进企业民主管理。要关注农民工的精神追求。改善工作环境,加强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弘扬企业文化,提升企业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丰富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尤其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增进人文关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推动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提高及其他有关因素的变化而相应调整;建立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现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物价等因素的联动增长;建立完善工资三方沟通协商或共决机制,充分发挥政府作为“第三方力量”在平衡“强资本,弱劳动”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确保企业职工特别是农民工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建立职工不满申诉处理机制,形成多渠道和多层次的社会化劳动争议调解网。

在现实生活中,员工与企业主在利益上天然存在不一致性,但劳资双方的冲突是相对的,合作是绝对的,员工和企业主是利益共同体,在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要强调劳资利益的一致性,引导员工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推动员工与企业主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共同努力,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通过利益共享同时增进双方利益,实现互利双赢。

第五,把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契机,加强土地确权工作,推进农地制度创新和土地流转,探索土地资本化,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整合农村资源,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土地是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情况下进城农民工最后的生活保障。稳定和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并积极尝试土地资本化,是解决外出农民工后顾之忧,建立农民工获得资产收益、带资进城的机制,推动农民工顺利转移的重要途径。同时,农业发展不仅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条件下希望实现的客观结果。特

别是在当前劳动力逐步走向短缺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进一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保障,是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举措。

维护农民工土地权益的重点是要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权利,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提高农民工土地等财产性收入。要做好土地确权工作,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面落实承包地块、面积、合同、证书和基本农田“五到户”。同时完善纠纷调处机制,并对规定“农转非”需要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的相关法律条款做适当的调整,让农民自主选择。在赋予农民土地产权的前提下,通过探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制度、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度、基于市场价格的征地补偿制度等创新推进农地产权的商品化和货币化,激活土地的财产功能。

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契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点是要构建支持农业发展的要素集聚和资源优化配置机制。通过土地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经营大户、种田能手集中,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推动财政支出和金融业务向农村地区倾斜,同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农业现代化建设,可考虑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组建区域性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社区银行等,引导资金向农村流动。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加强农业技术服务。加强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引导现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推进农村综合生产能力的跨越式发展、农村生活模式的转变和农民思想观念的进步。充分发挥农业专业化合作社作为新型现代农业经营组织的作用,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

四、研究结论

“用工荒”现象反映了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深刻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农村劳动力总量在减、结构在变、作用于劳动力转移的比较利益所形成的流出地“推力”和流入地“拉力”在弱化。“用工荒”现象的出现是对传统发展方式的挑战,同时也是重要的发展契机,它将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权”,推动用工成本的上升,成为倒逼发展方式转变、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力量。应对“用工荒”不仅要充分认识到在廉价劳动力时代逐步消失的背景下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培植新经济增长点的客观必要性,同时要主动探索完善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城乡协调共进。

以“用工荒”为契机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要实现“五个结合”。一是把推进区域产业布局调整与减缓过多的农民工异地流动结合起来。东部地区要在积极引导产业转移的同时推进产业升级,建成引领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区域;中西部地区要通过“双转移”,成为承接产业转移吸纳农民工回归,建成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继续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重点区域。二是把实施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均衡城镇化战略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结合起来。通过引导流动人口在不同层级城镇之间的合理分布缓解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避免大城市过度膨胀导致的“大城市病”;通过渐进的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的身份问题,改变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局面。三是把完善公共

就业服务体系与提升农民工素质结合起来。通过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就业环境;通过加强培训增加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改变对农民工“取而不予,用而不养”的局面。四是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与推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广大农民工体面的劳动和有尊严的生活,提升农民工用工企业凝聚力和员工的归属感,改变农民工“城市过客心态”。同时也要保障企业的健康发展,实现职工和企业双赢。五是把维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加强土地确权工作,推动土地流转,在推进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同时,推动农地向种田能手的集中,进行农地制度创新,让转移农民工通过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解决其创业安居“钱从哪儿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蔡昉(2010) :《“民工荒”现象:成因及政策涵义分析》,《开放导报》,第2期。
2. 程刚等(2004) :《珠三角农民工生存状况调查》,《中国青年报》,12月31日。
3. 成展鹏(2011) :《安徽缺工人数达25万 节后打响“抢工”大战》,中国新闻网,2月13日。
4. 辜胜阻(1991) :《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
5.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10)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中国统计出版社。
6. 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2011) :《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结构和特点》,国家统计局网站,3月11日。
7.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0) :《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3月19日。
8. 国家统计局(2011)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发布》,国家统计局网站,4月28日。
9. 姜贻(2011) :《尹蔚民:劳动力市场仍然供大于求》,《人民日报》,3月21日。
10. 李波平、田艳平(2011) :《两轮“民工荒”的比较分析与启示》,《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
11. 李杨、殷剑锋(2005) :《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2期。
12.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2007)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环境优化及政策安排》,《改革》,第7期。
13. 任社宣(2010) :《人社部发布企业用工需求和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调查结果》,《中国人事报》,2月26日。
14. 宋泓(2010) :《未来10年中国贸易的发展空间》,《国际经济评论》,第4期。
15. “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 :《中国农民工供给态势与“十二五”时期走向》,《改革》,第9期。
16. 王保林(2009) :《产业升级是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当务之急》,《经济学动态》,第2期。
17. 萧琛等(2010) :《“民工荒”的原因、应对与劳工市场制度变革前景》,《社会科学战线》,第11期。
18. 辛灵(2010) :《多地再度上调最低工资“抢人” 2011年的“工荒”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早一些?》,《南方都市报》,12月29日。
19. 郑秉文(2010) :《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用工荒”》,《经济学动态》,第3期。
20.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2010) :《浮世绘卷,生死劫局——“刘易斯拐点”之后的布局式投资》,中信建投网站,7月20日。
21. 郑风田(2011) :《民工荒其实是年龄荒》,《第一财经日报》,3月1日。
22. Hugh Patrick and Henry Rosovsky eds (1976) *Asia's New Giant How the Japanese Economy Work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责任编辑 朱犁)

ABSTRACTS

China's Labor Shortage: An Opportunity of Economy Restructuring and Upgrading*Gu Shengzu Li Hua · 2 ·*

The features and trend of China's current labor shortage reflect the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labor market. The causes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nclude the changing on China's rural surplus labor structure and the narrowing of the regional income gap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hina.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ecause of the labor shortage. It then focuses on accelerating trans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es of balanced urbanization by optimizing the industry structure, providing migrant workers citizenship, improving the administration of labor market, establishing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Trend of China's Gini Coefficient: A Calculation by Subdividing People Groups of 2000–2009's National Statistic Data*Yin Hongpan Liu Shuling · 11 ·*

To reduce the error factors on calculating China's Gini Coefficient, this paper first subdivides people (data of 2000–2009) into multiple groups according to 3 gaps, i.e. interregional, urban-rural and wealth, then sorts the groups of urban and rural according to each income level. The area method is used to calculate the Gini Coefficient. The finding shows that China's Gini Coefficient is at a high level. It became bigger during the 10th Five-year Plan period but kept stable during the 11th Five-year Plan period. Unde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in urban areas became one of the biggest contributive factors to Gini Coefficient.

A Study On Promoting China's Regional Human Capital*Wang Jinying Jia Shaomeng · 21 ·*

Based on the data of Year 2000 and 2005,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come gap, capital density, distance, space and education have always been playing big roles over the region's human capital growth. The results from big region models study clearly show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wth pol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on human capital. Therefore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 underdeveloped regions should overcome their disadvantages of human capital growth by restructuring inter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such as developing growth pole cities, vigorously pushing urbaniza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advancing education.

Gender Difference to Marriage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e Implications to China's Gender Imbalance Society*Liu Huijun · 33 ·*

Using the data of CGSS(2006),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gender difference of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isparity between groups based on marital status and quality and analyzes their relations.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as moderating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marriage are also studied.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 marriage, especially with higher marital quality, has a protective effect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 married couple has better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than a single person, and marital status is more important for men as well as marital quality for women. In additio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and play significant roles in promoting relationship of marriag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Non-Economic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Ding Juhong Deng Kebin · 44 ·*

This paper expands the research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that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ill fundamentally affect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oretically we believe that local governments will loosen its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or more benefits i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environment. Neverthele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rease of non-economic public goods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significantly non-linear. We later implement a new standard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set up a test model. With the panel data of 19 vice-provincial municipalities cities, the theoretical conclusion has been proven by our te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i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growth rate of non-economic public goods supply is significantly U-shaped. That is when the supply starts to increase the registration becomes tighten up. While along with the supply rapidly increasing the registration tends to loosen.